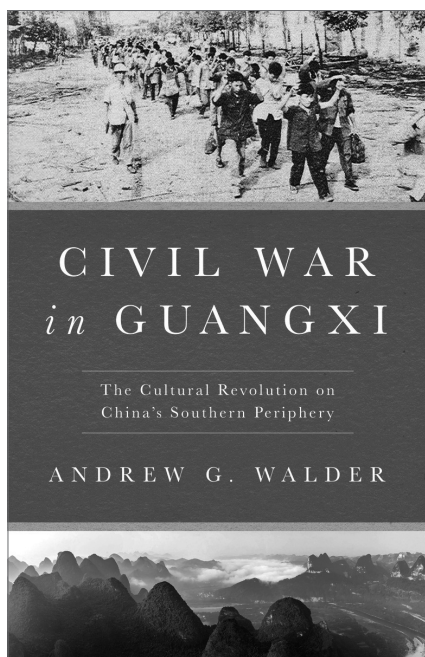


計量分析下的廣西文革

——評 Andrew G. Walder, *Civil War in Guangxi: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on China's Southern Periphery*

● 宋國慶、董國強



Andrew G. Walder, *Civil War in Guangxi: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on China's Southern Periphery*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3).

廣西是名副其實的文化大革命重災區。有關廣西文革期間的非正常死亡數字，官方各種統計都在

八萬以上^①，而一些民間人士則認為接近二十萬^②。長期以來，由於當局設置的種種禁限，關於廣西文革暴力的研究並不充分。上世紀90年代出現了若干零星著作^③，使人們對廣西發生的極端暴力有了初步認知。然而由於無法查閱官方檔案，這樣的研究只能淺嘗輒止。進入新世紀之後，又湧現了一批帶有回憶錄性質的著作和文章，披露了更多情況或細節^④。不過，由於多數作者都是當地文革親歷者，因此不論敘事還是分析都帶有強烈的個人感情色彩和狹隘的個體認知局限，學理性闡釋仍付之闕如。直到2011年旅美華人學者蘇陽出版其英文著作《文革時期中國農村的集體殺戮》（*Collective Killings in Rural China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以下簡稱《集體殺戮》）^⑤，上述狀況才得以改變。該書採用社會學視角和較為多元的資料來源，對文革期間廣泛發生在兩廣農村地區的集體屠殺進行了實證研究，並構建了一個系統性的解釋框架。儘管學界對該

廣西是名副其實的文化大革命重災區。長期以來，由於當局設置的種種禁限，關於廣西文革暴力的研究並不充分。直到2011年蘇陽出版其英文著作《文革時期中國農村的集體殺戮》，上述狀況才得以改變。

2014年，魏昂德依據2,200多本新編地方志中記載的各種數據，推算出1966至1971年間中國大陸非正常死亡人數。廣西異常突出的暴力問題由此進入了他的視野。前期研究的日積月累，最終促成了《廣西內戰》的面世。

書的某些結論存在爭議，但都高度肯定了它在研究議題和方法論方面的突破與創新^⑥。

本文要向讀者鄭重推薦的新書，是由蘇陽的博士導師魏昂德(Andrew G. Walder)教授撰著、由哈佛大學出版社於2023年推出的《廣西內戰：中國西南邊陲的文化大革命》(*Civil War in Guangxi: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on China's Southern Periphery*，以下簡稱《廣西內戰》，引用只註頁碼)。魏昂德是美國斯坦福大學社會學系教授，也是國際公認的文革研究權威。他和研究團隊二十多年來長期致力研究的一個重要課題，是文革期間非正常死亡問題。蘇陽在攻讀博士學位期間參與了該課題研究工作，並根據魏昂德的指示以農村地區為研究重點^⑦。《集體殺戮》一書即由他的博士論文發展而來，應該被視為該課題的階段性成果之一。2014年，魏昂德依據2,200多本新編地方志中記載的各種數據，推算出1966至1971年間中國大陸非正常死亡人數^⑧。廣西異常突出的暴力問題由此進入了他的視野。此後，他有意識地在一些著述中不斷涉獵廣西文革。前期研究的日積月累，最終促成了《廣西內戰》的面世。

下文將從全書內容梗概、理論框架和核心觀點、研究方法和資料，以及問題商榷等四個方面進行評介。

一 全書內容概覽

《廣西內戰》全書分為八章。第一章開宗明義地點出全書要探討

的主要問題：廣西文革暴力何以比其他地區更為嚴重？為了更加透徹地回答這個問題，作者又將其分解成三個相互連接的子問題：一是廣西文革期間兩大群眾組織「聯指」（廣西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指揮部）和「四·二二」（廣西四·二二行動指揮部）衝突的起源和性質是甚麼；二是為何相當數量受害者是「地、富、反、壞」（四類份子）等「政治賤民」；三是暴力的規模和程度如何。通過學術史梳理，作者認為實際上存在着兩條解釋路徑：一是把一連串造成重大傷亡的事件解釋成一種政治進程（political process），進而探討當時發生了甚麼以及此類事件如何演變成大規模屠殺；二是將此類暴力歸咎於廣西特有的民族或族群構成、經濟發展程度等地域性特點。他賦予這本新書的使命是，依據最新材料檢驗上述兩種解釋路徑，並尋找替代性解釋框架。

第二至四章歷時性地描述了文革初期廣西兩大派別的形成及其引發的派性鬥爭。1967年初毛澤東號召奪權後，廣西壯族自治區首府南寧也爆發了奪權行動，但奪權未獲得中央認可，並使造反派內部產生分歧。中央隨後責成廣西軍區進行軍管。在奪權行動中受到衝擊的原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兼廣西軍區第一政委韋國清，被任命為軍管會主任。4月，一部分造反派組織在中央文革聯絡員王荔支持下形成聯盟，繼續反對韋國清，同時支持前自治區黨委書記處書記伍晉南，被稱為「四·二二」派。其他造反派組織則在軍區規勸和撮合下組成

「聯指」，「支革反伍」。上述派別分野隨後從省城蔓延至全自治區，直達所有縣份。

在地方，支「左」部隊成為兩派分野的軸心。和全國很多地區一樣，在廣西執行支「左」任務的部隊主要是廣西軍區及其下轄各專區（市）軍分區和各縣人民武裝部（以下簡稱「人武部」）等地方部隊，同時也有少量聽令於中央和廣州軍區的野戰部隊。各地造反派組織在軍管後大多加入「聯指」，擁護地方部隊和韋國清，但也有一些與地方部隊不和的造反派組織加入「四·二二」，與「聯指」分庭抗禮。儘管從全自治區範圍來看「聯指」佔有明顯的數量優勢，但直到1967年底之前，「四·二二」由於得到中央文革小組和解放軍野戰部隊的支持，不但生存下來，而且還一度因為周恩來的稱讚，實力有所增加。在兩派組織實力大體均衡的情況下，在1967年夏天全國陷入武鬥高潮之際，廣西並不引人矚目。

第五至七章詳細論述了不斷加劇的武鬥和殺戮。1967年11月，廣西兩派在中央長達半年的協調下達成和平協議，但該協議很快名存實亡：1968年春天，廣西軍區、各專區（市）軍分區和各縣人武部為迅速控制局勢，在「聯指」配合下武力鎮壓「四·二二」，而「四·二二」則在部分解放軍野戰部隊支持下發起反擊，至此出現一波死亡人數高峰。鑒於當地不斷升級的武裝衝突嚴重干擾了國家援越抗美部署，中央最後接受韋國清和廣西軍區的說辭，於1968年7月3日發布

了「七三布告」。廣西當局隨即對「四·二二」實施大規模武力清剿，大量四類份子也被認定為「四·二二」的「盟軍」而慘遭殺戮。暴力事件於7、8月達致頂峰，使得廣西一躍成為全國死亡人數最多的地區。作者在分析數據時發現，各縣死亡人數差異很大，逾半數死難者集中分布在二十個縣（總數八十六個）。他還通過若干典型縣份案例，詳細論述了縣區官僚機器如何驅使農村基層幹部和民兵實施暴力，以及受害者所遭受的各種令人髮指的野蠻暴行。

第八章探討了導致廣西死亡率異乎尋常的若干影響因素。作者通過大量數據分析，否定了蘇陽在《集體殺戮》中提出的兩個重要觀點：第一，特殊的民族或族群構成導致廣西的高死亡率；第二，殺戮大都發生在距離政治中心較遠的偏遠山區或者缺乏專政力量的地方。他進而指出，各地死亡率與派性鬥爭的激烈程度有關——「四·二二」力量強大的縣份，特別是堅持抵抗到1968年7月的地方，遭遇了最致命打擊，死亡率普遍較高。

二 理論框架與核心觀點

《廣西內戰》一書的理論框架沿用了政治進程的分析路徑，但在具體論述中卻與前人有着顯著的不同。此前學者的政治進程解釋路徑主要分為三種論調：一是強調中央「七三布告」在廣西暴力中的主導作用；二是將廣西派別政治解釋為

作者通過大量數據分析，否定了蘇陽提出的兩個重要觀點：特殊的民族或族群構成導致廣西的高死亡率；殺戮大都發生在距離政治中心較遠的偏遠山區或者缺乏專政力量的地方。他進而指出，各地死亡率與派性鬥爭的激烈程度有關。

本書通過細緻分析深度捲入派性衝突的「聯指」、「四·二二」、廣西軍區和自治區黨政領導人的行為，否定了「保/造之爭」說。廣西政治分歧的實質是舊權力結構內部出現了內訌，表現為黨政機構內部的分裂、軍隊系統內部的分裂等。

維護現狀的「保守派」和挑戰現狀的「造反派」之間的鬥爭（以下簡稱「保/造之爭」）——這樣，廣西暴力就成了當權者為維護既有利益而無所不用其極的例證；三是從社會學集體暴力理論視角出發，將廣西的高死亡率歸結為基層社區對「政治賤民」實施的暴力（這是蘇陽提出的新看法）。魏昂德依據大量新史料重新審視了上述三種看法，並提出了一些新的洞見。

（一）派別鬥爭是「保/造之爭」，還是舊權力架構的內訌？

幾乎所有關於廣西暴力的研究，其邏輯起點都要追溯到引發派別對立的政治分歧。學界現有的主流敘事認為，廣西兩派政治分歧的焦點在於維護還是挑戰現狀——即造反派組織「四·二二」意欲改變現狀，因而與極力維護既得利益的保守派組織「聯指」及其背後的當權派（軍隊和官僚）產生了政治分歧和派性衝突，結果是保守派聯合起來暴力鎮壓造反派。徐友漁在其代表作《形形色色的造反：紅衛兵精神素質的形成及演變》一書中對這一觀點作出了簡明扼要的闡釋^⑨。

本書通過細緻分析深度捲入派性衝突的「聯指」、「四·二二」、廣西軍區和自治區黨政領導人的行為，否定了「保/造之爭」說。對於被認為「保守派」的「聯指」，魏昂德強調，雖然其核心組織最早是現有秩序的捍衛者，但在1966年10月中央發出反對「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資反路線」）的號召後，他

們也順應潮流變成了反對韋國清的造反派。後來之所以又轉而支持韋國清，顯然是出於實用主義的考慮——他們只有得到廣西軍區和中央的支持，才能與造反派中的對手相抗衡。所以「聯指」的立場搖擺是政治局勢變化的產物，其初衷是在派性衝突中求得生存，而非維護舊秩序。至於被認為「造反派」的「四·二二」，魏昂德指出，他們支持伍晉南和其他一些自治區高級黨政幹部，因而很難稱得上是名副其實的「造反派」。他們也不天然地反對「保守」的軍方，因為後來成為「四·二二」核心組織的「廣西工總」最初也曾尋求軍方的支持。「四·二二」對軍方的反感，始於軍方收回對他們的支持且試圖組建一個排斥他們的造反派聯盟（頁40-43）。由此可見，導致廣西派性衝突的政治分歧，並不是維護還是挑戰現狀的問題。

那麼軍管會的行為是否反映出軍隊天然地傾向維持現狀呢？作者並不這麼認為。本書提到，軍方最初非常迅速地宣布支持造反大軍和由它領導的奪權。他們後來之所以收回這種支持，主要原因在於造反大軍下屬組織「廣西工總」處理權力移交不當，並打壓那些持不同意見的造反組織（頁40-43）。本書還提到，不論是支持還是反對韋國清的原地方黨政領導幹部，均被軍方剝奪了權力。「支韋派」幹部僅限於充作軍管會行政事務方面的顧問，「反韋派」幹部則紛紛逃往「四·二二」控制的區域，以躲避軍方和「聯指」的迫害。由此可見，軍方介

入地方紛爭並不意味着他們想要維持現存政治體制，反而標誌着黨政機構的軍事化。軍管會的建立表明舊權力結構已被摧毀（頁51）。

綜上所述，不論是「四·二二」和「聯指」，還是支持兩派的軍隊幹部和地方幹部，都很難被簡單地判定為舊權力架構的支持者或反對者。加入或支持兩派是在瞬息萬變的境況下做出的決定，任何人都不確定他們的抉擇會帶來甚麼後果，當然更不清楚北京高層的意圖（頁51）；類似的情況在其他地區也很普遍^⑩。魏昂德據此斷言，廣西政治分歧的實質並不是「保/造之爭」，而是舊權力結構內部出現了內訌。這場內訌表現為黨政機構內部的分裂、軍隊系統內部的分裂，以及黨、政、軍幹部之間的分化組合和公開對抗。地方權力結構內部的派性鬥爭，加上中央高層在處置廣西問題時進退失據，最終導致廣西事態失控，並以一派武力摧毀另一派收場（頁50-51）。

魏昂德的上述觀點無疑具有顛覆性。他提醒我們注意，在解釋文革派別鬥爭時，「保/造」二元對立的視角已經過時，取而代之的是權力結構裂變視角。

（二）軍隊究竟是穩定力量，還是暴力之源？

軍隊的角色始終是文革研究繞不過去的一個話題。軍隊介入地方政爭始於1967年初，當時全國各地掀起了造反、奪權的高潮。為了保證全面奪權的勝利並迅速穩定

地方局勢，毛澤東決定派軍隊支持「左派」群眾。之所以作出如此決定，是因為群眾性造反運動導致黨政部門停止運轉之後，原本置身事外的軍隊是唯一可以用來維繫社會正常秩序的力量，因而支「左」部隊從一開始就被賦予了政治和民政兩大任務——政治任務是支持「造反派」向「走資派」（「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奪權，以推進「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民政任務是保證重要的政府職能部門和企事業單位的正常運轉。在此後幾年風雲變幻的政治形勢下，軍隊扮演了重要角色，直到1974年前後才逐漸淡出。文革結束後，1981年中共中央〈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出於現實政治考量，肯定了軍隊在穩定地方局勢方面發揮的作用，對於其不當舉措及消極影響則語焉不詳^⑪。

隨着文革研究的推進，人們對軍隊在派性鬥爭中所起作用的認知不斷深化。魏昂德和其他一些學者早就指出，軍隊支「左」給地方派性衝突增添了一個新的因素，使得地方政治更加複雜，派性鬥爭更加激烈。在一些地區，軍隊系統內部亦發生分裂，不同部隊分別支持不同派別相互廝殺，造成地方上的無政府狀態，一度威脅到中共政權根基^⑫。《廣西內戰》一書依據大量內部檔案文件，更加詳實地論述了軍隊與文革暴力的關係。

廣西的軍隊支「左」以1968年春天為分界點。1967年1月中下旬，廣西軍區下屬部隊和駐扎在廣西的野戰部隊紛紛介入地方文革，公

魏昂德早就指出軍隊支「左」使得地方政治更加複雜，派性鬥爭更加激烈。在一些地區，軍隊系統內部亦發生分裂，一度威脅到中共政權根基。《廣西內戰》依據大量內部檔案文件，更加詳實地論述了軍隊與文革暴力的關係。

本書促使我們重新思考文革期間軍隊支「左」的實際作用，以及軍隊與暴力的關係。中央出動軍隊的初衷是盡快平息政爭、重建秩序，但實際情況卻使原本紛繁複雜的派別衝突變得更難以解決，也促使原有的權力結構發生裂變。

開表態支「左」。在上海「一月風暴」發生後兩周左右的時間裏，地處邊陲的廣西80%左右的縣市已完成奪權。當地奪權之所以如此迅速，是因為絕大多數奪權是由幹部造反派單獨實施，或由他們主導的造反派聯盟完成——即他們在上級領導的督促下，迅速推翻了自己的直接領導。這樣的奪權不僅引發了那些未能參與奪權的造反派的質疑，亦招致了一些參與奪權的造反派的不滿。加之中央對於如何區分「左派」並無明確標準，所以軍隊支「左」必然激化業已存在的矛盾（頁58）。

其後，中央突然任命被造反派批鬥的韋國清為軍管會主任，也導致廣西支「左」問題複雜化。這一任命自然是出於越戰的考量，但要讓反韋的造反派轉而支韋並非易事。儘管廣西軍區做了大量勸導工作，但仍有一些造反派組織堅持反韋。因而，1967年5月在南寧形成了「聯指」和「四·二二」兩大對立派別：前者支持韋國清，反對伍晉南；後者反對韋國清，支持伍晉南。不難理解，「聯指」成了廣西軍區眼中的「左派」而得到支持，「四·二二」則成為「左派」的對立面遭到打壓。可以說，正是軍隊的介入促成了兩大派成形（頁58）。

之後數月，大多數地方的造反派亦紛紛在「聯指」和「四·二二」之間選邊站隊（儘管在很多地方兩派鬥爭的焦點問題與南寧截然不同）。更大的問題是廣西和全國其他一些地區一樣^⑬，軍隊自身也因支「左」問題發生分裂——地方部隊支持

「聯指」，而野戰部隊則支持「四·二二」。與地方部隊相比，野戰部隊在政治地位、武器裝備和常規訓練等方面佔據上風，因而他們的支持給「四·二二」帶來很大底氣。不過，野戰部隊隨時有可能被調離，所以他們的支持不會是長期和穩固的。而地方部隊的明顯優勢在於其指揮結構體系一直未受到明顯衝擊，具有很強的穩固性和很高的組織化程度。尤其是在基層，人武部控制的民兵組織可以深入到區、鄉鎮直至行政村。通過與地方部隊結盟，「聯指」勢力也得以下沉到最基層。這使得他們在與「四·二二」鬥爭中佔據巨大組織優勢（頁63）。

由於雙方背後都有軍隊支持，所以兩派的派性衝突持續不斷。但也正由於都有軍隊支持，雙方才維繫了一個相對平衡的狀態，因而在整個1967年，廣西派別衝突所造成的傷亡從全國來看並不突出（頁82）。但在1968年春天，由於支持「四·二二」的野戰部隊被陸續調離，之前的微妙平衡逐漸被打破。7月，中央又根據廣西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和廣西軍區的報告，發出措辭強硬的「七三布告」。早已迫不及待的地方軍隊和「聯指」隨即實施全面動員，最終用武力將「四·二二」剿滅，使廣西文革傷亡數量躍居全國第一（頁117-18）。

本書促使我們重新思考文革期間軍隊支「左」的實際作用，以及軍隊與暴力的關係。中央出動軍隊的初衷是盡快平息政爭、重建秩序，但實際情況卻使原本紛繁複雜的派別衝突變得更難以解決，也促

使原有的權力結構發生裂變。軍隊成為新權力結構的核心力量後，為了獨佔權力大施殺伐作風，以致釀成悲劇。這既證明了軍隊支「左」決策之失當，也揭示了軍人干政的風險。

(三) 廣西暴力的性質及影響因素是甚麼？

蘇陽在《集體殺戮》中提到，針對四類份子的大量屠殺，導致廣西的文革傷亡數量遠遠大於其他省區。魏昂德對這個論斷表示認同，不過談到四類份子為何受到大規模迫害的原因，他認為蘇陽的解釋與實際情況存在較大出入。我們更加認可魏昂德的解釋，因為他掌握了更加權威的資料。

蘇陽的解釋主要基於各種公開資料。他在系統爬梳這些資料時，未發現鄉村基層有派性活動，所以他斷言大規模屠殺的發生，是廣西軍區不斷強化「嚴厲鎮壓階級敵人」的宣傳話語和大力宣傳貫徹中央「七三布告」的結果。另外，在蘇陽看來，許多行兇者都是居住在同一社區的鄰居。這促使他應用「族群暴力」概念或「社區模型」理論來解釋廣西暴力，但真實情況並非如此。

魏昂德在早期研究中也主要依據各種公開資料（尤其是全國各地的新編地方志），但到2012年他得到了一批非常難得、非常系統的內部檔案資料，在研究上取得重大進展。他依據這批檔案材料中的數據統計分析指出：在廣西近半數的縣份，「四·二二」派非常活躍；同時

有超過三分之一的縣份，「四·二二」勢力甚至深入到公社和村莊一級，因而在「四·二二」活躍的地區，血腥暴力的最大目標是「四·二二」成員（當然也包括一些被牽累的四類份子）；而在「四·二二」不那麼活躍（甚至根本不存在）的地區，四類份子則成了鎮壓的主要對象（頁123-24、191）。魏昂德還指出，基層的劊子手並非普通平民，而是國家代理人（如民兵、糾察隊員等）。他們實施暴力，並非因為族群內部的仇視，而是在履行當局——尤其是人武部主導的縣級政權——的命令。這些命令把「四·二二」描繪成「反革命」，強調必須武力鎮壓（頁127）。這樣，施暴就成了平定「叛亂」的英勇壯舉。

接下來的問題是，究竟有哪些影響因素造成了廣西各地死亡率的高低不一？魏昂德和蘇陽對此也有不同答案。《廣西內戰》沿着蘇陽早先提出的論述路徑，採用數據統計分析的方法，對「民族或族群構成」、「經濟發展水平」和「地理距離遠近」在暴力中的作用進行了重新測試（頁174-86）。

蘇陽認為，少數民族組成的縣最不可能發生集體殺戮，其次是幾乎沒有客家族群居住的縣。殺戮最嚴重的縣是那些混合着客家人和非客家人的縣，以及那些完全由客家人組成的縣（因為客家人宗族觀念濃厚，且尚武）。魏昂德的數據統計分析卻顯示，以少數民族為主體的縣，死亡率與全區平均水平基本持平；客家人佔比較大的縣，死亡率也不高（甚至低於廣西平均水平）。

《廣西內戰》沿着蘇陽早先提出的論述路徑，採用數據統計分析的方法，對「民族或族群構成」、「經濟發展水平」和「地理距離遠近」在暴力中的作用進行了重新測試。其結論基本排除了「民族或族群構成」因素對廣西暴力的影響。

這一結論基本排除了「民族或族群構成」因素對廣西暴力的影響。

蘇陽還認為，人口密度低、經濟落後、黨政力量薄弱的地區（通常分布於遠離政治中心的偏遠地區）的暴力活動，較其他地區嚴重。但魏昂德卻在研究中發現，遠離政治中心的邊境地區，死亡率較低；而在黨政力量較強大的地區，死亡率更高。此外，他還指出革委會成立愈晚的地區（由於遭到「四·二二」反對），其暴力程度愈高。如果以1968年元旦為起點的話，8月15日成立革委會的縣，其死亡率是3月15日成立革委會的縣的兩倍（頁186）。

蘇陽和魏昂德的不同結論，在很大程度上源於雙方所依據的資料不同，以及他們對暴力性質的認知不同。蘇陽認為當地暴力是社群內集體暴力，因而愈是遠離國家直接控制的地區，暴力愈容易發生。而魏昂德則認為暴力是政治進程的結果——即軍方與「聯指」結成聯盟，以「七三布告」為「尚方寶劍」，打着「重建秩序」的旗號，肆無忌憚地武力鎮壓「四·二二」派。因此，導致死亡率差異的影響因素只能是那些影響鎮壓效力的因素，如「四·二二」的活躍程度、黨政力量強弱和距離政治中心遠近等。我們認為，鑒於本書最新採用的內部檔案，魏昂德的結論更符合實際情況。

三 研究資料和方法

《廣西內戰》最重要的資料來源是《廣西文革機密檔案資料》（以

下簡稱《廣西文革檔案》），同時亦參考了地方志、年鑒、中共組織史資料等其他資料（頁23-24）。《廣西文革檔案》由廣西壯族自治區委員會整黨領導小組於1987年編纂，共計十八冊，12,237頁，900萬字^⑭。當時正值全國清理「三種人」（造反起家的人、幫派思想嚴重的人、打砸搶份子）運動後期，也是廣西調查處理文革遺留問題（即殺人問題）進入尾聲的時候。當局編印這套資料的目的，主要是給各級政府清理文革冤假錯案和清查「三種人」提供依據。由於內容涉及廣西各地大量暴力事件和暴行細節，所以它們最初僅僅作為內部參考資料，只有高級黨政官員和相關機構工作人員才能看到，後來這批資料少量地流入社會。斯坦福大學圖書館於2012年前後出資購買了完整一套，成為本書主要依據的史料。

這套資料內容廣博，全面覆蓋了廣西自治區級、地市級、縣級黨政機構和各高等院校、大中型國營企事業單位及官辦社會團體的文革歷史。資料以「大事記」和「大事件」兩種歷史題材分類，對各地區、各部門、各行業以及一些重要單位的派性衝突、傷亡情況進行了詳實記錄。由於這套資料全部摘抄自原始檔案和後期調查資料，其權威性和真實性毋庸置疑。儘管此前也有個別研究者引用過這套資料^⑮，但像本書這樣全面利用與深度解讀尚無先例。

採用何種研究思路和技術手段來處理十八冊《廣西文革檔案》所包含的海量信息，是研究者遇到的首要難題。魏昂德能夠全面地、創

蘇陽和魏昂德的不同結論，在很大程度上源於雙方所依據的資料不同，以及對暴力性質的認知不同。魏昂德認為暴力是政治進程的結果。鑒於本書最新採用的內部檔案，魏昂德的結論更符合實際情況。

造性地利用這套資料，是因為他在此前研究全國範圍的非正常死亡時，曾帶領一個訓練有素的編碼團隊，依據2,200多本地方志編製過一些數據組(data sets)^⑩。在本次涉及廣西暴力的研究過程中，魏昂德團隊依據《廣西文革檔案》和其他資料編纂了類似的數據組：一個是橫截面數據組(cross-sectional data set)，另一個是事件數據組(event-based data set)^⑪。這兩個數據組是本書進行各種量化分析的數據來源(頁208-13)：

橫截面數據組以廣西的八十六個縣市為考察對象，錄入的信息包括兩類：一是自然信息(包括各縣市人口及其構成、學生數量、黨政人員數量等)；二是當地重大政治事件(如奪權、軍隊首次介入、造反派組織首次出現等)發生的時間，以及各時間節點的傷亡數據等。第一類信息基本取自地方志、組織史等資料，第二類數據來源主要是《廣西文革檔案》。事件數據組的分析對象包括4,937個歷史事件，其中的數據信息分為三類：「行動者」(actors)、「行動類別」(type of action)、「受害方」(harmed parties)，以及與之相關的傷亡數據。這些數據信息通過行政區劃代碼從而與橫截面數據組的數據發生聯繫，其有效應用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通過繪製不同類型、非重合事件圖表，表現這些事件發生的時間和地點分布特點；二是通過深入探究行動者和受害方細節，更加全面、準確地回答造成廣西高死亡率的原因(頁212)。

事實證明，由於資料的詳實，事件數據組數據信息的錄入並非易事。以行動者項相關信息錄入為例，此前魏昂德團隊依據地方志資料編製全國事件數據組時，只需對「軍政當局」和「造反派」這兩類行動者的行為進行編碼即可。而《廣西文革檔案》所載的行動者，既包括解放軍、人武部、民兵、糾察隊、革委會、村級政府機構、幹部或軍人等官方行動者，亦包括「聯指」、「四·二二」、紅衛兵、「群眾」或「造反派」等非官方行動者。這些新類型的出現，無疑大大增加了編碼工作量和複雜程度。魏昂德團隊為了保留有價值的信息，不得不重新設計編碼規則，即先在行動者項下設立「當局」、「聯指」、「四·二二」、「紅衛兵/造反派」以及「群眾」等五類，再在「當局」項下設「社隊領導」、「農民民兵/糾察隊」、「革委會」、「公安/軍隊」等四類次級行動者。

行動類別項數據的錄入與之類似。相較於地方志資料，《廣西文革檔案》所載的行動類別更多。比如造反派組織的行動，可能是襲擊政府機關、襲擊其他造反派、襲擊軍事機關、搶劫倉庫、搶槍、綁架，或者一場屠殺等。為了最大限度地保留有價值的信息，魏昂德團隊遂將事件類別由原來的十一種擴充到了二十七種。

本書突破了傳統的文革史研究方法，廣泛應用了社會學和統計學的統計分析方法和分類比較法，是跨學科研究的典範之作。與傳統的文本闡釋相比，基於統計數據所做

本書突破了傳統的文革史研究方法，廣泛應用了社會學和統計學的統計分析方法和分類比較法，是跨學科研究的典範之作。與傳統的文本闡釋相比，基於統計數據所做的分析和得出的結論顯然更具解釋力，也更具顛覆性。

專區一級在廣西暴力中的角色，似乎被作者有意無意地忽視了。實際上，在暴力發生的過程中，專區當局不僅起着向下傳輸省級命令的作用，甚至還直接參與、協調了轄區內的大規模鎮壓活動。

的分析和得出的結論顯然更具解釋力，同時也更具顛覆性。本書依據各種數據共繪製不同類型圖表三十餘幅。任意檢視這些圖表，不難發現魏昂德對它們的分析都與本書的核心議題或子議題相關。比如，為了說明地處邊陲的廣西為何也像全國多數地區一樣在很短時間內完成奪權，他繪製了表格「1966年廣西各社會群體平均人數（按行政區級別劃分）」。¹⁰表格顯示，文革初期在大城市造反運動中表現突出的大中學生和工人等群體，在廣西八十六個縣市數量非常少，一些地方甚至沒有。在社會力量並不足以撼動黨政機關的地方，為何奪權仍如此迅速？魏昂德通過對上述人口構成的統計分析，發現縣一級的行政官員數量相對於工人數量的比值遠遠高於專區（市），幹部與其他群體的比值更是如此。這意味着在縣一級的奪權中，幹部群體因其相對強大的組織力量和動員能力，扮演了主導性角色（頁55-56）。

縣級幹部群體之所以積極投身造反運動，是由於中央在1966年10月前後大力號召幹部揭發批判所謂「資反路線」，而且省會南寧的幹部已率先造反。為了進一步驗證這一看法，魏昂德又繪製表格「奪權類型（按行政區級別劃分）」。¹¹表格顯示，與四個大城市由群眾造反組織聯盟（含工人、學生和幹部）主導的奪權模式不同，廣西有七十九個縣市的奪權要麼由幹部造反派單獨完成（這是主要的模式），要麼由幹部造反派領導的造反派聯盟完成。這說明廣西各地的奪權之所以

如此快速，是因為它們是以自上而下的動員模式完成的（頁57）。由此可見，至少就幹部群體而言，文革時期的「造反」並非真正意義上的造反，而是執政黨的一場內訌。

四 問題商榷

我們認為本書是一部關於廣西暴力的典範著作。它基於紮實而權威的史料，借助了計量分析方法，令人信服地解釋了廣西暴力為何如此嚴重。本書不僅對此作出了全新解釋，同時也為文革研究提供了全新範式。不過，本書也存在一些值得商榷的問題。

第一，本書正確地指出了縣級人武部在廣西暴力中的主導作用，特別是它們要為發生在基層的民兵暴力負責；同時也細緻論述了省級當局如何構陷「四·二二」派、促成中央「七三布告」的出台。但是專區一級在暴力中的角色，似乎被作者有意無意地忽視了。實際上，在暴力發生的過程中，專區當局不僅起着向下傳輸省級命令的作用，甚至還直接參與、協調了轄區內的大規模鎮壓活動，是暴力的「贊助者」之一。例如，上思縣正是在欽州專區當局的命令下，才調集了一千多名民兵進行「剿匪」，致使該縣成為廣西死亡率最高的縣級單位¹²。再如，在1968年夏天，如果沒有桂林專區統一協調，不可能調集十二個縣數千民兵進入桂林市參與鎮壓「四·二二」。而這些民兵返回原籍縣後，又進一步加劇了當地的暴

力，使桂林專區成為廣西死亡率最高的專區^①。同樣是在這個夏天，河池專區當局指揮數縣民兵和解放軍一起圍剿鳳山縣的「四·二二」派，使得該縣的死亡率僅次於上思縣^②。類似例子還有很多。

第二，關於遇害者中的「群眾」身份。在論及受害者身份時，本書提到了一個遇害群體——「群眾」（頁124-27）。譬如表格6.2顯示，「群眾」佔遇害者比例相當大（16.6%），超過「四類份子」佔比（14.2%）。但「群眾」究竟包括哪些社會群體，作者並不十分確定。他猜測可能包括四類份子，也可能包括「四·二二」派成員親屬和與之有關聯的人。我們認為，根據當時的歷史環境，四類份子不大可能被歸入「群眾」。因為在毛時代「群眾」與四類份子是截然對立的兩個群體——前者是統治階級，後者是階級敵人。

第三，書中還有極少量技術性錯誤。例如：（1）頁33，錯把伍晉南說成是廣西黨委第二號人物。相關資料顯示，文革前夕廣西區黨委二號人物應是常務書記喬曉光，而非擔任書記處書記的伍晉南^③。（2）頁57，作者錯將「聯指」的成立時間寫成1967年4月底，而正確的時間應該是5月底。（3）頁67，“Nanning”被錯拼成“Nanjing”。（4）頁132-33，對縣以下基層行政區域的解釋也有誤差。新中國成立後，鄉、鎮是縣一級行政單位的基層行政區域。1960年前還曾設區，但區公所不是一級政權組織，而是縣級政府的派出機構。人民公社化以後，鄉、鎮全部改稱人民公社，受區管轄。所以書中認為「區」

與「鎮」並列（管轄「鄉」）並不準確。（5）頁176，廣西客家人口大於20%的縣應是十個，而非八個。但這些都是很細小的問題，絲毫不影響全書的解釋框架和學術質量。

五 小結

總而言之，《廣西內戰》一書不論在研究方法，還是在學術觀點方面，都取得了較大突破，是近些年海外文革研究的又一力作。可以預見，本書的問世，將對文革研究範式的轉換產生一定影響。

註釋

① 中共廣西壯族自治區黨委整黨辦公室編：《處理「文革」遺留問題、清理「三種人」文件彙編》，第二冊（南寧：內部資料，1986），頁273、526；當代中國叢書編輯部：《當代中國的廣西》，上冊（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2），頁130。

② 參見宋永毅：〈血雨腥風中的廣西文革真相〉（2013年10月16日），民主中國網，<https://minzhuzhongguo.org/default.php?id=36064>。

③ 參見鄭義：《紅色紀念碑》（台北：華視文化公司，1993）；Donald S. Stutton, “Consuming Counterrevolution: The Ritual and Culture of Cannibalism in Wuxuan, Guangxi, China, May to July 1968”, *Comparative Study in Society and History* 37, no. 1 (1995): 136-72。

④ 例如何紹榜：《韋國清上將——主政廣西二十年》（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

頁211-23；曉明：《廣西文革痛史鉤沉》（香港：新世紀出版社，2006）；晏樂斌：〈我參與處理廣西文革遺留問題〉，《炎黃春秋》，2012年第11期，頁13-20，以及網絡上錢文俊與小平頭的系列文章。

⑤ 參見Yang Su, *Collective Killings in Rural China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下文引述該書觀點，不再另註。

⑥ 有關該書的討論與評價，參見Joel Andreas, "Collective Killings in Rural China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17, no. 5 (2012): 1547-49; Daniel Leese, "Collective Killings in Rural China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Comparative Politics* 12, no. 1 (2014): 272-73; Patricia M. Thornton, "Atrocious Outliers", *The Review of Politics* 74, no. 2 (2012): 335-37；宋國慶、董國強：〈廣西「文革」期間非正常死亡研究〉，《領導者》，2016年2月號，頁154-62。

⑦ Andrew G. Walder and Yang Su,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the Countryside: Scope, Timing and Human Impact", *The China Quarterly*, vol. 173 (March 2003): 96.

⑧ Andrew G. Walder, "Rebellion and Repression in China, 1966-1971", *Social Science History* 38, no. 3-4 (2014): 532.

⑨ 徐友漁：《形形色色的造反：紅衛兵精神素質的形成及演變》（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9），頁73、99。

⑩ 參見董國強：〈社會史視野下的文化大革命研究〉，《中共黨史研究》，2012年第2期，頁65-74。

⑪ 中共中央：〈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1981年6月27日），中國政府網，www.

gov.cn/test/2008-06/23/content_1024934.htm。

⑫ Shinichi Tanigawa, "The Policy of the Military 'Supporting the Left' and the Spread of Factional Warfare in China's Countryside: Shaanxi, 1967-1968", *Modern China* 44, no. 1 (2017): 35-67; Dong Guoqiang and Andrew G. Walder, "Forces of Disorder: The Army in Xuzhou's Factional Warfare, 1967-1969", *Modern China* 44, no. 2 (2018): 139-69.

⑬ 參見Dong Guoqiang and Andrew Walder, "Forces of Disorder", 139-69。

⑭ 宋永毅團隊已將其數據化，參見宋永毅主編：《廣西文革機密檔案資料》（Deer Park, NY：國史出版社，2016）。

⑮ 如宋國慶、董國強：〈廣西「文革」期間非正常死亡研究〉，頁154-62。

⑯ Andrew G. Walder, *Agents of Disorder: Inside China's Cultural Revolution* (Cambridge, MA: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9), 18.

⑰ 魏昂德已將兩組數據組鏈接發布到網上，以方便研究者索取。參見<https://sociology.stanford.edu/people/andrew-g-walder>。

⑱ 《廣西文革機密檔案資料》，第八卷，頁22-30。

⑲ 晏樂斌：〈我參與處理廣西文革遺留問題〉，頁13-20。

⑳ 《廣西文革機密檔案資料》，第十卷，頁182-83。

㉑ 中國共產黨廣西壯族自治區組織史資料編纂領導小組：《中國共產黨廣西壯族自治區組織史資料》（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1995），頁426。

宋國慶 安徽大學創新發展戰略研究院講師

董國強 復旦大學歷史學系教授